大阪公立大学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吉田松陰□《孟子》的受容：以《□孟余□》□中心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5-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洪, □民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319

吉田松阴对《孟子》的受容[1]
—以《讲孟余话》为中心—

洪伟民

一、序言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幕末激进思想家。幼名虎之助、大次郎、松次郎、寅次郎；通常名矩方，字义卿，号松阴，又号二十一回猛士；别号蓬头生、无一、瓢一房。其父杉百合之助是长州藩下的一个家禄只有二十六石的下级藩士，世代致仕于藩主毛利家。五岁时，为其叔父吉田大助之养子（其叔父乃吉田家之养子），从其“山鹿流”家学，十一岁时便在藩主面前讲授《武教全书》，得到了藩主的肯定；其家学一直受教于吉田大助的得意门生渡边六兵卫、林真人、玉木文之进、石津平七等人。至22岁为止，吉田松阴共计为藩主讲学8次，讲授的主要内容为《武教全书》、《中庸》、《孙子》等。期间，19岁时正式独立成家师，22岁起从藩主游江户。在江户从佐久间象山习兵学。嘉永6年（1853）美国佩理率军舰来港，逼日本开国，幕府无奈，要求一年后予以答复。史称“黑船来袭”。当时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吉田松阴觉得光担心、愤怒无济于事。于是上书《将及私言》[2]等，献给藩主。翌年，安政元年（1854）佩理又率七艘军舰开进浦贺，逼迫幕府答复。期间，幕府曾考虑选派青年俊才留学海外，佐久间象山为此也曾向幕府推荐了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十几名青年俊才，但未被采纳。因此，佐久间就让吉田以漂流的方式出国，但吉田没有答应，而是冒着违反“海禁”的危险，登上了已离开浦贺、停靠在下田的美国军舰，与美军正面交涉，意图坐美舰出国，被拒后与同行的金子重辅去长崎奉行所自首。史称“下田事件”。1858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迫使幕府政权同意《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向美国开放五个港口。松阴感于幕府的软弱，上书《时事论》，意在唤起有识之士尊王攘夷，中兴日本，以免蹈大清之覆辙；未被采纳。又意图刺杀幕府阁僚间部诠胜，事败被捕。1859年10月27日被处刑，年仅29岁余[3]。在日本，他被称为是“维新革命里的一个急先锋”[4]。

有关吉田松阴的先行研究举不胜举。但就吉田松阴受《孟子》影响的直接研究并不多，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也有，但一是不多，二是多囿于《讲孟余话》本身的较多。比如，中国学者鲁霞的《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解读》[5]、杜永宽的《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6]、郑航的《浅析吉田松阴教育思想对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受容》[7]等；日本学者相对较多一点。比如，野口武彦的「われ聖賢におもねらず——吉

---

[1]本文部分内容、观点参照了拙文《从比较文化的视点看中日“忠孝观”之异同》（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编、《大连近代史研究》第六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年 10 月、PP. 461～477）一文。对其中《讲孟余话》部分做了重点论述，着重论述了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解读，并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扩充、修改变动、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资料和注释。

[2]山口县教育会编纂《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猛省录》所收、PP. 287～326。岩波书店普及版、1939 年。下称《全集》。《将及私言》以外，还包括了另外的《急务条议》、《海战策》、《急务策》、《急务则》等四策。

[3]前揭、第三卷别册附录。

[4]德富苏峰《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84 年、P. 20。

[5] 《日本研究》、2004 年第四期、PP. 73～78。

[6] 《日本问题研究》、2014 年第六期、PP. 37～43。

[7]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 年 10 月、PP. 55～56。

田松陰の『講孟余話』上・下」[8]、岡崎正道的「吉田松陰の士道論と民本思想」[9]、「吉田松陰の尊王思想」[10]と「吉田松陰の革命思想」[11]、東中野修的「孟子の禅譲放伐思想と吉田松陰の『同と独』の思想」[12]、三宅紹宣的「吉田松陰の民政観」[13]、山県明人的「吉田松陰の思想と教育－１－『講孟箚記』にみたる経世済民思想の本質」[14]、桐原健真的「論争の書としての『講孟余話』――吉田松陰と山県太華、論争の一年有半」[15]、冈崎正道的『吉田松陰の思想』等。

其中，冈崎正道论文连续四期，针对吉田松阴进行了研究。第一期主要讲“一君万民”问题[16]；第二期主要讲“士道与民本”问题[17]；第三期主要讲“开过攘夷”问题[18]；第四期讲“草莽崛起”问题[19]。冈崎论文引用了大量的吉田松阴原始资料，其中也包括松阴的《讲孟余话》。鲁霞论文提出了“至诚的为人之道”、“大忠的为士之道”和“开国、攘夷、尊皇三位一体的救国之道”[20]，论述了吉田松阴利用讲解《孟子》来探究日本的救国之道。杜永宽论文认为吉田松阴区别了中日国体的不同，把孟子的“君臣观”限制在中国，而倡导“皇国史观”的国体论。尽管如此，他依然吸收了孟子“君臣观”的思想因素。在面对藩主、将军和天皇三个效忠对象时，松阴强调对藩主和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对将军的忠，更多的是出于民生和维持国内安定的考虑，假若幕府无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则孟子所说的“汤武放伐”即可发挥理论作用。而且松阴认为所谓“性善”即“得五伦五常而不失于外”，将忠孝、仁义统归于“忠”，以“忠”来解释“性善”，赋予“忠”以普遍性和绝对性，改变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核，为其“君臣观”打下了人性论的理论根基[21]。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学术界仅有的对吉田松阴进行较为全面论述的专著是郭连友的《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该书尤其从吉田松阴对孟子思想的受容入手，论述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同时还论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吉田思想的影响以及吉田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22]。

那么，吉田松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解《讲孟余话》并有所取舍的，又是希望通过讲解《孟子》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的呢？

二、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解读

《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在日本更多得是受到排挤的。正如日本江户时期的兰学家桂川中良（1744～1808）在随笔《桂林漫录》中引明末谢肇淛《五杂俎》中的“倭奴之重儒之书，信佛法。凡中国经书，皆以重价购之。独无《孟子》”所言，“《孟子》属忌

[8] 上・『文学』、1982 年 2 月、PP. 19～32；下・『文学』、1982 年 3 月、PP. 64～80。
[9] 『日本思想史研究』、1983 年 3 月、PP. 31～44。
[10] 『文芸研究』、1983 年 1 月、PP. 31～41。
[11] 『日本思想史研究』、1980 年 3 月、PP. 19～32。
[12] 『アジア研究所紀要』第 9 巻、1982 年、PP. 39～53。
[13] 『史学研究』、1993 年、PP. 26～46。
[14] 『政治経済史学』、1995 年 2 月、PP. 490～509。
[15] 『歴史評論』、2004 年、PP. 64～80。
[16] 『アルテスリベラレス』(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紀要)、「吉田松陰の思想Ⅰ」第 65 巻、1999 年、PP. 49～59。
[17] 前揭、「吉田松陰の思想Ⅱ」第 66 巻、PP. 77～88、2000 年 6 月。
[18] 前揭、「吉田松陰の思想Ⅲ」第 68 巻、2001 年 6 月、PP. 43～56。
[19] 前揭、「吉田松陰の思想Ⅳ」第 69 巻、2001 年 12 月、PP. 43～55。
[20] 前揭、《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解读》、PP. 74～77。
[21] 前揭、《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PP. 37～43。
[2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3 月、PP. 144～199。

讳之书，与日本神之御意不合”[23]。

那么，《孟子》到底是如何与日本的“神之御意”不合的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孟子所主张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汤武放伐”的易姓革命思想有关。

江户时期日本古学派、国学派、后期水户学派等都对《孟子》有过不同评价。虽然古学派的山鹿素行（1622～1685）、荻生徂徠（1666～1728）、伊藤仁斋（1627～1705）等都对孟子的“易姓革命”予以了较高的评价，但国学派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对孟子的“革命论”和“民本论”予以了否定，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甚过之恶言也。而《孟子》终篇，只屡言对亲当孝，却无一言云对君当忠。……以此一章，可知孟轲之大恶。此虽为人君教人之语，实乃过于信口之恶言也。此书非人臣者宜读之书，实乃教人臣不忠不义之物也。”[2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来被看做亚圣的孟子，居然被本居宣长直呼“孟轲”其名，可见，孟子在国学派那里根本就不待见。

而后期水户学派的代表人物藤田东湖（1806～1855）则干脆著有《孟轲论》，站在尊王思想的立场上对孟子的“革命论”、“王道论”等予以了严厉的批判。

吉田松阴对《孟子》也做了批判，主要表现在他的《讲孟余话》里。该书是吉田松阴25岁时的作品。与通常对《孟子》释义、考据、正字等不同，吉田松阴是对《孟子》章句进行逐句解读，并结合日本当时的时事政治进行评论。因为刚开始的受听者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狱中囚犯，所以，吉田松阴尽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话进行讲解。从下田事件失败后在狱中为囚人讲课开始起，至翌年出狱后讲完为止，历时一年。后整理成书，初名《讲孟箚记》，后改名为《讲孟余话》[25]。

松阴作《讲孟余话》，可谓“抱孟子书，讲究礱磨，欲以求其所谓道者”[26]，所以他在最后一讲里说“开卷第一义在国体人伦，故首论君臣之大义”[27]。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松阴企图通过《孟子》来探究真正适合于日本的“道”。那就是他的“国体论”和“君臣论”。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窥吉田松阴是如何批判性地解读《孟子》的。

1、国体论

松阴的“国体论”可以从他对《尽心下・第36章》的论述来认识。他认为宇宙间的原理有普通和特殊二种，通过对本章的论述，吉田松阴强调了日本国特有的国体。

他在本章的讲解中这样说：

> 羊枣和膾炙、姓和名，一同，一独也。食同而不食独，不讳同而忌独。……道，天下公共之道所谓同也；国体，一国之体所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如皇朝君臣之义，卓越万国，一国之独也。如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是，亦其一国之独也。以讳名不食羊枣之义推是，可知国体最重。……然如一老先生之说云，道、天地之间一理，其大原出自天，无我与人之差，无我国与他国之别。皇国之君臣论同一于汉土之君臣，余所万々不服也。……改彼道难从我道，犹如吾之万々不可从彼道矣。然强云天地间一理，可云于事实不通矣。应以独同之义推究是

[23] 《日本随笔大全》卷一、P.659。
[24]《本居宣长》、《日本思想大系》卷四十、岩波书店、P.471。
[25] 『全集』「别冊・年譜」。
[26] 《全集》第三卷〈序文〉、P.4。
[27] 《全集》第三卷、P.513。

[28]。

本章大意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因父亲曾哲喜欢羊枣，在父亲死后每见羊枣便思念父亲而不忍食之。为此，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膾炙和羊枣哪个更好吃？”孟子说：“那当然是膾炙好吃。”公孙丑又问：“那样的话，（曾哲也喜欢膾炙，曾子如果不忍吃羊枣的话，也应该不吃膾炙才对），为什么曾子只吃美味的膾炙而不吃羊枣（而世间却把这种行为称作是孝行呢）。”孟子回答说：“膾炙好吃是大家都喜欢的，羊枣是因个人而异被喜欢或不喜欢的；忌名而不忌姓，是因为姓是共通的而名是区别于他人所特有的。”曾子父亲一个人喜欢的羊枣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如同人死了忌其名而不忌其姓，姓是许多人共有的，而名是那个人特有的一样[29]。就像天下之道是公共之道，相同的；而一国之国体是独特的一样。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者是天下共有相同的，而我日本的君臣大义却是超越万国、独有的。就好比匈奴人雄壮者吃肥美事物，而老弱者吃其剩余之物。这是贵健壮、轻老弱。父亲死了可以娶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都可以娶其妻为妻，这也是一国之独特之处。从忌讳名字而不吃羊枣之义来看，可知国体之重要。……然而，有老先生（山县太华）说，道，天地之间都一样出自天，我们与人没有区别，我国与他国也无区别。把我日本君臣关系论同于大清君臣之关系，我是万万不服的。

本章表明了事物的普通性和特殊性。在这里，松阴把它拿来论述“国体论”，通过对这一章节的论述，解说了日本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国体”。

所谓“国体”，是指国家的体制、性质，最初是由水户藩的会泽正志斋（1781～1863）在《新论》里首先使用的[30]。会泽认为，日本国家不变的本质就是忠孝合一的祭祀先祖的体系。换句话说，对先祖的“孝”延伸到对天皇的永远的“忠”——这就是日本的“忠孝一致”。显然，这和中国的“忠孝不能两全”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会泽的“国体论”对吉田松阴的影响很大。在他幼少时父亲就让他背诵《新论》。从那时起，松阴就向往着水户藩。嘉永4年（1851）末至翌年初，吉田松阴在东北游学时途径水户藩，在那里，他遇见了梦寐以求的会泽正志斋。那一年，会泽71岁，而吉田松阴才22岁。在水户藩他待了有一月余，期间拜访了会泽6次。松阴把这段时间看作“是其所以通天下事、得天下力”[31]的时期。此时，吉田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对外认识，这其中包括了他的“国家观”、“民政观”“忠孝观”等。归藩后，松阴拼命学习日本历史[32]，逐渐形成了他的思想观。可以说这次的水户藩游历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后来解读《孟子》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吉田松阴的这段经历，他在解说这一章节时自然就会受到会泽的影响。吉田认为，人道是天下公有之道，而“国体”是一国所特有的。换句话说，人伦五常是一般之道，而日本的君臣之道则是日本所特有的。有些人把天下之道看作是普天之下都一样的东西而没有认识到事物的特殊性， 这实在是大谬。而吉田所强调的“国体”，则是“万

---

[28] 《全集》第三卷、PP. 498～499。关于《讲孟余话》，本文因找不到吉田松阴的汉文原文，只能从普及版的日语的训读文中译成中文，可能与其原文有误，当以原文为准。下同，不一一注出。

[29] 《全集》第三卷、PP. 497～498。

[30] 文政 7 年（1824），英国船来到水户藩。第二年，幕府发布了『異国船打払令』。以此为契机，会泽撰写了由「国体（上、中、下）、「形勢」、「虜情」、「守禦」、「長計」等七章组成的『新論』。日本思想大系『水戸学』所収『新論』、岩波書店、1973 年。

[31]山口県教育委員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九卷所収、1934 年、P.165。

[32] 关于这一点，吉田松阴在『睡余事録』里说「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以何立天地？故先读『日本書記』三十卷，续之以『続日本紀』四十卷」。『全集』第二卷所収、P.283。

世一系、君臣一体、忠孝一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话。他在《讲孟余话》的最后一讲里说“开卷第一义在国体人伦，故首论君臣之大义”[33]，可见得他对“国体论”的重视。在第一讲里，针对“孟柯，邹人也。游事齐宣王梁惠王”一句，他批评道：

> 孔孟离生国，给事他国不济。凡君父，其义一也。愚昏我君，去生国而往他求君，齐于玩愚我父而出家，父邻家之翁矣。……或曰、孔孟之道大也，兼欲善天下，何必自国焉。且得明君贤主，行我道时，天下共蒙其泽，我生国固不在其外。曰、欲善天下而去我国，同欲治国而不修身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序，决非可乱。……尧舜让其位于他人，汤武放伐其主，无害于圣人。我邦上自天朝下至列藩迄，千万世々袭而不绝，非汉土等可比。故汉土之臣纵如半季渡之奴婢，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故其所也。我邦之臣为谱第之臣，与主人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决无可弃主而去之道。呜呼，我父母何国人焉，我衣食何国之物焉。读书、知道，亦谁恩焉。今少以不遇主，忽然去是，于人心如何。我起孔孟，欲与此论义[34]。

吉田松阴在这里批判了孔孟之道，认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他国事君，如同离开生养自己的家而去认邻家之翁为父一样。有人说“孔孟之道之大，何必拘泥于本国。况且遇到明君贤主，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不也可以惠泽天下，当然包括自己的国家”。吉田却认为，想要治理天下却又离开自己的故土，如同想要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自我修身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这种“大学之序，决非可乱”。因此，他说：“不爱敬其亲而爱敬他人，《孝经》云悖德悖礼。”[35]他强调了日本不同于中国的“国体”是：日本是没有“尧舜让其位于他人、汤武放伐其主”的“万世一系”和臣民与君主的“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的“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国体。中国的臣子可以如家里的奴婢一样按季节、时期择其主子之善恶而转移，而日本则万万不可。因此，他说“今少以不遇主，忽然去是，于人心如何”？这也许就是日本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将军掌握实权而始终没有篡位的“万世一系”现象的原因所在吧。

吉田松阴并不重视在中国人看来是孝子的曾子的行为，而只是借此来说明不同于他国的日本的“国体”，由此强调君与臣的关系。可以说，比起中国人的“孝”来，日本人似乎更关心“忠”的问题。《孟子》的“易姓革命”论，在这里得到了否认。

吉田松阴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点，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受到西洋诸国的窥视并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1853年6月3日，美国政府由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率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抵达江户，以武力威胁要求幕府开国通商；并声称：如不答应，就要以武力来决胜负。长期锁国的幕府，面对美国的炮舰，不知所措，不得不要求延长一年时间再予答复。翌年3月，佩理又率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抵达神奈川附近，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胁下，幕府只好与美国签订了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为美国的专用港口，并给美国以领事权。而且，此后日本给予其他国家之所有权益，均须无条件地给予美国。其后，英、俄、荷等也纷纷跟进，与日本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结束了锁国时代，幕府藩政体制也随之瓦解。

---

[33] 《全集》第三卷、P.513。
[34] 《全集》第三卷、PP.18～20。
[35] 《全集》第三卷、P.47。

面对幕府政权的无能，松阴期望通过深明国体大义，以臣对君的“忠”来一死报国。

> 我以何制是，无他，前所论我国体之与外国所以异之大义矣。阖国之人为阖国而死，阖藩之人为阖藩而死，臣为君而死，子为父而死之志确乎，何畏诸蛮也。[36]

吉田松阴在这里强调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强调的是“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思想。他认为，清朝殖民现状，就是因为象孔孟那样“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离开自己的出生国去他国事君、即对君不忠的结果引起的。要避免中国的现状，就要正视日本的臣对“万世一系”之君的至死不变的“忠”的国体。如此，则可“何畏诸蛮也”。

但是，在《尽心上44章》里，吉田松阴说道：

> 余因此章有一议。当癸丑甲寅之变，余与同志忧国家、天下，共论云：“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而后平天下，虽是一定之论，亦为寻常之事，所以非论非常。且今日之事，成天下相互维持之形势，谋之于天下争论有志之士，上自列侯，下迄至大夫、士庶，当然协心戮力，相共谏诤幕府，遵奉天朝，撻伐外夷。是则成己成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起并下功夫，乃今日之急务也。”东西奔走，无一日宁处，天下与吾同志者亦不少，奈何俗论之辈交々沮其议云：“自国不治，何以与天下列藩谋事？何以谏诤幕府？又何以尊奉天朝、撻伐外夷？故宜先内自治。”此说遂顽乎成国是，然以余思，是皆惜身、家、顾妻子，而无分毫忧天下、国家之心，不忠不孝之徒之言[37]。

“癸丑甲寅之变”就是指美俄来船逼日本开放门户之事，因为美国佩理率领的军舰都是黑色船身，所以日本也称“黑船来袭”。这里是说：“黑船来袭”以后，我与忧国忧民的志同道合者商议，认为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而后平天下，虽是不变的定论，但那是平时之论，而非非常时期的说法。况且现在诸藩互相维持其领地，相谋于天下正论有志者。上自诸侯、下自大夫、士庶，整个日本一致团结，齐心协力，共谏幕府、拥戴朝廷、撻伐外夷的侵略，才是当然之道。据此，成事成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在同时努力实现这点上下功夫，这才是当今急务。”为此，我东奔西忙，一天都没有休闲过。虽然与我志同道合者不少，奈何凡夫俗论压制我的看法，说什么“自己的藩地都不好好治理，何以与天下诸藩谋事？何以能为幕府出谋划策？有何能尊奉朝廷为之驱除外夷？所以应该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很遗憾的是，这种论调居然成了国家的方针大律。但我认为这只是怜惜自己、照顾妻、子而没有丝毫为天下、为国分忧之心所然，是不忠不孝之徒之语。

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松阴说的话与之前的有所矛盾。但仔细阅读，其实还是一样的。在第一讲里，松阴曾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秩序不能乱，而在本章里却说这种秩序可以同时进行而不必拘泥于谁先谁后。显然，前面说的是“平时之论”而非“非常时期”。松阴认为面对欧美列强侵略的“非常时期”的日本应该上下“一致团结，齐心协力，共谏幕府、拥戴朝廷、撻伐外夷的侵略，才是当然之道”。况且，跟中国随时随地可以去国择主不同，松阴并未主张日本也可以任意地离开自己的属藩另任藩主。实

---

[36] 《全集》第三卷、P.20。

[37] 《全集》第三卷、PP.438～439。

际上，松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游历东北时因与人有约，而可以出游的许可证书还没批下来，为了不失约，松阴不惜冒着犯罪的危险现行出走。等他归藩后被判“亡命罪”，开除士籍、剥夺世禄，成了一个自由的浪人。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如中国人那样“去国”而加入其他的藩籍，认其他的藩主为主君。在这里，松阴只是强调，面对欧美列强，当前的要务之急是不分先后、大家要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拘泥于一个藩属之地，更不是说大家可以随意地离开自己的藩属之地。否则，日本无法与欧美抗争。所以，松阴的这段话，更应该看作是其对欧美列强的攘夷[38]“对应之策”，也就是他说的是“非常时期之论”。就是说，在非常时期不应拘泥于那个先哪个后，应以“为天下”、“为国”为准。

但是，吉田松阴的基于“万世一系、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国体论”还是受到了当时的藩儒山县太华的强烈批判。

山县太华（1781～1866）生于周防，名祯，字文祥，通称半七，号太华。开始从家学徂徠学，后入江户的林家转学朱子学。天保 6 年（1835）至嘉永 3 年（1850）任教于荻藩校明伦馆。可以说，太华是正统派儒学的代表人物。因此，松阴将《讲孟余话》的完成部分求教于太华、并期望得到他的好评[39]。

安政 3 年（1856）8 月，松阴“仆以书致（太华）翁，求《讲孟余话》之评。太华评语并增《附录》”[40]。但是，满怀希望的松阴得到的是太华对《讲孟余话》的严厉批评。关于这一点，松阴在对友人的中村道太郎表示过。

> （太华）翁著《评语》一卷，逐条驳之。凡我所犖犖之尊王攘夷、重国体、励臣节、育人才诸条，翁未取一所。茫然自失，惛不能进。[41]

但是，山县太华写的《讲孟箚记评语》逐条批判了松阴的《讲孟余话》，尤其对松阴很看重的“尊王攘夷”、“国体论”等都予以了否定。因此，在松阴看来，太华的《评语》只是“崇幕府而仰朝廷”[42]。

愤怒无比的松阴认为谁都可以成“帝王”，那“皇国（日本）与支那、印度以何别焉”？就此以激烈的言语与太华开始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道”与“霸道”的论争。时年安政3年（1856），松阴27岁，太华76岁。

论争首先围绕着松阴很自信的“国体”展开。针对松阴的“道，天下共有之道，所谓同也；国体，一国之体，所谓独也……云我与人无差，我国与他国无别，皇国的君臣与汉土君臣同一论之，余万万不服也”中的“国体”一词，太华予以了反驳。

> 云国体，宋时之书等往往有之，我邦之书未当见。于水府始云出，彼之《新论》言“国体”，我邦云“太阳之出所”，云“元气之源所”。于形体如言诸洲之首，自固迂谬之言，如前所述，太阳大于地球，一周外天，一昼一夜，少无休而照世界万国。何出自我邦焉？若言出自东，我国之东有亚墨利加洲，亚墨利加之东有西洋诸国，天地圆体，东西何有常之？又气充满天地之间，包大地而无处不在，云何原委之有焉？且地有形体，云我邦当首，尤儿童之见，甚可

---

38 “攘夷之事，责在吾辈。” 「諸友に示す」、『全集』第五卷、P.303。
39 「太華翁の講孟箚記評語の後に書す」、《全集》第三卷、P.547。
40 《吉田松阴全集》第七卷、大和书房、1972～1974 年、P.440。
41 《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大和书房、1972～1974 年、P.360。
42 「太華翁の講孟箚記評語の後に書す」、『全集』第三卷、P.547。

笑也。[43]

太华在这里批驳了水户藩的会泽正志斋的《新论》，从地理概念否定了日本是“日出之地”、“元气之源”的说法。太华认为，说太阳出自东方的日本，那日本之东有美洲，美国之东有西洋诸国，天地圆体，何有东西定说？再说气，充斥在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又何说出自何处？因此，说太阳出自日本，是地球中心，是对地理的无知，是“儿童之见、甚为可笑”。

接着，太华又说道：

> 道，理也。古之道字，后世以理字释曰：道理也。可云的实深切也。有理有气；有气有理。虽不可离，理无形，气有形。今，以风言之，虽有拔树飞石之力，见之无物。虽无物，以其有力见之，有形也。……天地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物，而后阴阳五行之理寓之，其理即人伦五常之道也。是天地之间凡人物皆所同，岂唯有和汉也。世界万国皆同也。[44]

太华在这里论述了“理”、“气”的“无形”与“有形”。针对松阴所说的日本特有的“国体”，太华认为万物生自阴阳五行，其理即是“人伦五常”。这是人类共有之物，岂是中国、日本才有的？为此，他还说道：

> 自固世界万国皆同，是故我国无别于他国，人皆因学之功磨出此理，其善者愈善，其不善者可改之，变异归同也。……余窃思，当世称皇朝学、国体学等，出自水府一流之学，非独排斥外国耳。可见再兴皇朝之意有之。如前追言，日本当今之势，镰仓以后，与公家、武家别两样，是之世称以前为王，以后称武家。公家给司位，武家给司土地人民也。王臣事王朝，武家事将军家，其势定六百年也。给司位贵而无权；给司土地人民权势甚重。位虚名而土地人民实也。以是，再兴皇朝，不得不贵其名义。云皇国、云神州、云国体，皆所以杨名也。依是又以名义降贬将军。乃如称霸云公是也。[45]

太华在这里继续论述了日本和他国一样，并无什么特别。所谓“皇国”、“神州”、“国体”无非为了杨名而已。针对太华的评语，松阴认为国家遭难时，太华先生如果去别国奉仕君主，那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46]。但太华认为，所谓“国体”概念，在日本现存秩序下将引起大的混乱[47]。况且，“国体”的中心就是“万世一系、君臣一体、忠孝一致”，而纵观日本历史，却并非如此。因此，太华进一步说道：

> 云我国君臣卓越万国者，又何在哉？其后明智光秀杀信长时，从羽柴秀吉者多。秀吉终得天下。其后秀吉薨去，天下又归武臣德川氏。云我国君臣卓越万国者如何哉。又藤原专权，信赖、义朝、清盛、义仲等不臣，北条氏的跋扈，

---

[43]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二、《全集》第三卷、PP.606～607。
[44]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二、《全集》第三卷、P.602。
[45]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二、《全集》第三卷、PP.609～610。
[46] “国家他日有变难时，先生去事他国心甘哉？如我虽死万万不能。”「講孟箚記評語の反評」、《全集》第三卷、P.550。
[47] 参照野口武彦观点。『王道と革命の間』、筑摩書房 1986 年、P.294。

> 镰仓以来武家专以威福，其外战之间，如臣叛君、弑君者比比不绝，亦可云君臣之义、卓越万国哉？但无夺天子之位代是者，虽可说我邦之贵所，信赖、义仲、清盛等拘幽天子，义时、高时迁天子以远岛，如率尊氏兵犯阙，不臣之甚，何异于夺者？又如镰仓氏有天下土地人民，不可云不夺。[48]

太华认为，日本历史上臣子迁徙天子、拘幽天子、甚至弑杀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虽说没有篡位，但实际上把握实权的却是将军（臣子），“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这与中国“易姓革命”的“国体”有何不同？又与篡位有何不同？又哪里可以说“我国君臣之义卓越万国”呢？但吉田松阴为之反驳，认为：

> 然信赖、义仲、清盛之恶逆，而未至篡夺者，国体如何矣？且信赖、义仲、清盛不旋而灭。唯赖朝独开霸业，虽渠奸贼，亦少有奉戴天朝之意也。[49]

太华列举日本历史上不臣的“信赖”、“义仲”、“清盛”三人，说明松阴说日本“君臣之义卓越万国”是没有根据的，即使没有篡夺天子之位，但篡夺“天下土地人民”是不争的事实；而松阴却认为正是因为没有篡夺“天子之位”，不就是日本与众不同的“国体”吗？因此，他反驳说：只要做了天朝的大将军，就是可以看作是天朝的忠臣。万一有不忠之事，谏规之责，全在诸侯之下[50]。

两人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争论，吉田松阴逐渐由“谏幕”者转向了“倒幕”者。

那么，既然日本的“国体”是“万世（叶）一系、忠孝一致”的，那么，“君臣一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君臣论”的。

2.君臣论

吉田松阴的国体论，离不开他的“君臣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尊皇论”的一部分。在《讲孟余话》里，最初出现“尊皇论”的是“王臣幕臣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君臣关系”来。

1855年6月27日，在《梁惠王上・第七章》中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51]的讲义中，他论述了藩的施政，应重视教育、广用人才。

> 与列藩协心，尊崇幕府。上奉事天朝，下守封疆；内爱养万民，外使夷狄感服。其伟功盛烈孰如是矣。……本邦以武义为本，中世以来唱武门武士，……吾愿与诸君励志，讲究士道，练磨恒心，使其武道武义不负武门武士之名，虽灭死而无有万々遗憾，岂非愉快之甚”[52]。

这里，他提出了臣的团结一心“奉事天朝”和武士的应“不负武门武士之名”的“忠”。而“合心协力，奉事天朝，固其职也”，乃是为臣的应尽之职。

吉田松阴把这种一般日本人的“忠孝观”当作“应尽之职”，视其为武士、臣子的

---

48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二、《全集》第三卷、P.605～606。
49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二反評」、《全集》第三卷、P.606。
50 「講孟箚記評語下の一反評」、《全集》第三卷、P.595。
51 《全集》第三卷、P.39。
52 《全集》第三卷、PP.41～42。

本分。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武士道为什么产生于日本而不是中国了吧。如果说中国人的“孝”是继承先祖意志、不使家业败落继而使其发扬光大的话，那么，日本人的“孝”则是象祭祀神和祖先一样，以虔诚之心“奉事今上天皇陛下，其孝之极致是绝对的孝、即忠”。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把忠孝分开来讲是很难的，“言孝含忠，言忠含孝”[53]。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吉田松阴为什么会批判在孟子看来“吃羊枣”是“孝”的事情了。

此外，他在与山县太华的辩论时说，“重天朝、轻幕府，浅々之见也。有天朝也有幕府，故尊天朝安皇国大计，即幕府亦自重也”[54]。故应与幕府一起“共尊天朝”、“无分幕臣、王臣，云人之尊朝廷、敬幕府、攘夷狄、爱苍生。忘此四者，逆贼也”[55]。

在吉田松阴看来，“不忠吾主，安能忠皇朝；不忠皇朝，安能忠吾主。皇朝与吾主分而二之，习俗也”[56]。因此，在家事父为孝，为臣事君为忠。人要各事其主、各尽其忠，治天下、安四民，然后可以说对皇朝的忠。如果事君不忠、事父不孝，则君臣、父子相悖，天下之争纷起，忠于皇朝、奉于皇朝、奉事皇朝也就不可能了。

可以说，吉田加强了对臣子安于本分奉仕主君的认识。

接着出现的是他的天皇不可侵论。

1856年夏天，他在评点门人斋藤荣藏的作文中认为，在批判天皇的失德前，应先追究作为臣下的自己的辅弼之责尽了没有。即政务之责在臣下而不应在天皇。

同年6月4日夜里，他在《尽心下・第14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讲解时认为，日本的“万々代后，国土山川草木人民，皆皇祖以来保守护持者也”[57]。因此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说是“忘却国体”[58]。

吉田松阴提出这个命题，是因为当时的藩校明伦馆出了题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说”的作文题让藩生答题。对此，他在讲解这一章时说：

> 近闻明伦馆文题，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说》。余因考，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语出《六韬》，非必出圣经，汉土亦非通论。因思禅让、放伐之事而云。若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则“天下为一人之天下”明也。又，汉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官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之说也；“家天下”者一人之天下之说也。又，汉土历代之人多云，“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亦皆为一人之天下也。[59]

这里的“圣经”是指孔孟等儒家经典，“汉人”指的是汉朝人。松阴在这里试图竭力地说明，出自《诗经小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分明就是“天下为一人之天下”之意，即使出于“禅让、放伐”而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非“定论”，何况是日本。因此，他说日本“从天下臣民来看，如天皇那样值得尊敬的人没有了；从天皇那里看，天下没有如臣民那样宝贵的人了”，这种臣民关系，自开国以来，“未曾有分开过一天”。[60]

---

[53] 引自平野春江《忠孝之研究》、同文书院、1936年版、P.296。
[54] 〈讲孟箚记评语草稿的反评〉、《全集》第三卷、P.569。
[55] 《全集》第三卷〈讲孟箚记评语草稿的反评〉、P.570。
[56] 《全集》第三卷〈讲孟箚记评语草稿〉、P.566。
[57] 《全集》第三卷、P.463。
[58] 《全集》第三卷、P.463。
[59] 《全集》、PP.463～464。
[60] 《全集》第三卷、P.463。

同时，他在评点门人斋藤荣藏的文章时还说：

>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者，是支那人语也。支那即然，在神州断々不然也。仅案、我大八州所肇皇祖，传给万世子孙，无穷天壤者，非他人可觊觎也。其一人之天下亦明也。……如出汤武者放伐之举，虽其心仁也，虽其为义也，……绝非神州人也。而神州之民，尚何与之？……万一有如支那所谓诛君弔民者，虎狼豺犀，绝非人类也。故曰：“天下，一人之天下。”而其云非一人之天下者，特支那人语耳。然虽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为己任，尽死以仕天子，不以贵贱尊卑为之隔限。是则神州之道也。[61]

在这里松阴明确指出了日本是“天下是一人”的，“天下非一人”之说只是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人无论“贵贱尊卑”，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尽死以仕天子”；如果看着欧美列强欺负日本而无动于衷，则其罪犹胜于“逆贼”[62]。因此，日本国家的兴废盛衰都在天皇。如果国家因此而陷入不幸，那也是没有办法的。这时候如果象中国一样进行禅让放伐革命的话，那就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即使国家灭亡也必须信奉天皇一个人的命令[63]。天下臣民只要做到尽忠天皇即可。“天皇的不可侵论”在“忠”的前提下被成立、君臣关系也被赋予了臣子、臣民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了。

可以说，吉田松阴在这里强调的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以家庭的“孝”为主的忠孝观，他所强调的则是以对天皇的“忠”为主的忠孝观。因此，他在《离娄上・第26章》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的论述时说：“无后虽大不孝，违父母意者亦不可云孝矣。”[64]在他看来，孝父母和忠君主是一样的，“忠孝”是“一致”的。中国人的“忠”、“孝”是两个不能并列的概念，因“父母在”[65]做孝子，就不能做事君的“忠臣”。是故中国人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66]的说法。而吉田松阴则认为“不孝”就不能“忠君”。圣人舜有违父母之意，是不能称作为孝的。因此，他说：“舜实无此事而孟子发此论，可云诬圣人；舜实有此事而孟子发此论，可云阿圣人。”[67]这或许可看作是这两种不同“忠孝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吧。

同样的例子可以在《离娄上・第11章》的“人々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讲解中反映出来。孟子认为孝悌可使“天下平”，而吉田松阴则认为君臣关系才是“天下平”的关键。“天下不平”是因为未尽君臣之道。因此，他说：“君应尽君道而感格臣，臣应尽臣道而感格君”[68]。

又比如，当他得知幕府未经朝廷同意而擅自与美签订了不平等通商条约后就说：

> 今幕府明明违敕，罪塞天地。（中略）以此上幕府。曰：遵奉敕旨，天下

---

[61] <丙辰幽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P.139～141。日语中“支那”指中国，原本并无贬义。二战中对华蔑称而不再使用。这里为了保持原文的统一性，仍用其“支那”之说。

[62] 《讲孟余话》<告子上>：坐视四夷跋扈者，其罪比逆贼重百等也。吾与其人不共戴天。《全集》第三卷、P.320。

[63] 旧版《全集》第三卷、P.32。

[64] 《全集》第三卷、P.196。

[65]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第四）

[66] 《韩非子・五蠹篇》：“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P.449。

[67] 《全集》第三卷、PP.197～198。

[68] 《全集》第三卷、P.182。

之公义也。幕府或不以为然。吾藩直请天子决事，决不能阿同也。[69]

幕府是天朝的臣子，没有天子的许可而擅自行事，当然是“违敕”、其罪“塞天地”。因此，遵奉“敕旨”才是“天下之公义”。松阴还认为，天下乃天朝之天下，非幕府之私有，“故幕府固当率天下诸侯清天下耻辱”[70]。很显然，松阴在这里批判了幕府的作为臣子的不当行为。就是说，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是天皇的责任、而是如幕府一样的臣子不尽“臣道”的结果。即便是普通臣民，同样有责任。比如，他在给高杉晋作的信里这样说：

> 仆，交纳足下，非徒为读书稽古，自固将建报国大计也。……当今天下事，万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臣子之责也。知不得不为而不为，有所为不成，皆为非俊杰也。[71]

这里是说，我并非是为了读书才收你做弟子的，而是为了共图报国大计的。当今天下事，如何攘夷报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臣子之责。明知此事却不作为，却非天下俊杰所为。这些都是松阴门生离开他以后与他的通信联系。高杉晋作只是松阴的一个学生，从中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松阴强调的仍然不是“天子”的责任，而是臣子、臣民的责任。

因此，在中国或许会视君主之优劣而选择进退、甚至取而代之；在日本则必须“君臣一体”、与君主“同死生休戚”。

> 朝廷失权，罪在摄关将军；摄关专权，罪在其官属；将军攘权，罪在其臣仆。……诚人人各各守其道，而远其罪，则君者以诫其臣、臣者以诫其君、长者以饬其属、属者以规其长、父者以训其子、子者以劝其父、智以喻愚、贤以导不肖，谋虑之长，积累之渐，上自摄关将军，下至农工商贾，终当归之。[72]

松阴在这里始终没有批判君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罪责”都在臣下。这跟孟子的“放伐革命”思想显然是不一样的。在松阴看来，臣民各守其道，中心回归“天子”才是正道。因此，在中国人看来是重要的“孝行”的，在日本人看来未必就是。这或许是以“孝”为主体的中国人的“忠孝观”与以“忠”为主体的日本人的“忠孝观”的不同之所在吧。

吉田松阴的忠孝观念并不是他的独立存在的思想观念，而是与日本传统武士道和忠孝观、尊皇攘夷论等有密切关系的。但吉田把这种原本只要求武士、臣子的“忠孝”观念普及到了普通民众身上。他在《士规七则》里还要求武士必须做到，但在《讲孟余话》里则要求普及到平民百姓。这显然受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的影响。

《士规七则》第一条说“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也。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73]。而其第二条则说“盖皇朝万叶一统，邦国之士世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

---

[69] <戊午幽室文稿>、《全集》第五卷、P.190。
[70] 《将及私言》<大义>条、《全集》第二卷、P.298。
[71] 「高杉暢夫に與ふ」、『全集』第五巻、PP.113～114。
[72] <丙辰幽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158。
[73] 「士規七則」、『全集』第四巻、P.20。

继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74]。

吉田松阴认为“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关系最为重要，是日本之士必须知道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日本特殊的“国体”所决定的。即任何情况下，武士、臣子也不能离开君主而另择主子。否者，就是“蒙皇室之恩”而“失君臣之义”[75]。在吉田松阴看来，武士、臣子终身不仕二君，对主君示忠，是为报恩[76]。因此，新渡户稻造在其《武士道》一书中说“在中国儒教的伦理是顺从父母为第一责务；而日本则是忠义最为优先”[77]。君臣关系用“忠孝”来表示。这种关系一旦破了，那么，所谓“五伦”也就不存在了。吉田所强调的臣对君的“忠”以及以死殉国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就是“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君臣关系”。

如果仅仅只是强调武士、臣子对主君的忠，那吉田松阴解读《孟子》也没什么新意了。他在指出武士、君臣关系之后，特别指出平民百姓也可以不畏生死、尽忠保国，提出了新兴的君臣（君民）关系。比如，他说“奉敕而死，死犹生也。背敕，生犹死也”[78]。虽然他强调武士为了国家应该“不惜生命”，但他更认为“为了国家不惜牺牲生命者，虽没有技艺也是武士；即使有技艺，但不肯为国牺牲者绝非武士”[79]的君臣观。。

实际上，吉田松阴自己就是“慷慨赴死”的最好实证。他认为，与其忍耐羞耻之事，不如一刀之下守义而死来得痛快。“快一死而扬名后世；阙一义而荷羞终身”[80]。因此，他在刺杀弹压攘夷之士的老中间部诠胜失败后自首，并不惜有被判死罪的危险而将刺杀计划和盘托出。在吉田看来，“死非所好，亦非所憎。尽道安心，便是死所也”[81]。在给友人的诀别书中，他写道“为幕府”、“为主公”、“为天子”而死，“死而不朽，亦何惜哉”[82]。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他在“下田事件”中的《投夷书》。

日本国江户府书生瓜中万二、市木公太呈书

贵大臣将官执事：

生等赋禀薄弱，躯干矮小，固自耻列士籍，未能精刀枪刺击之技，未能讲兵马斗争之法。汎汎悠悠，玩愒岁月。及读支那书，稍闻知欧罗巴、米利干风教，乃欲周游五大洲。然而吾国海禁甚严，外国人入内地与内地人到外国，皆在不贷之典。是以周游之念，勃勃然往来于心胸间，而呻吟踯躅，盖亦有年矣。幸贵国大军舰连樯来泊吾港口，为日已久。生等熟观稔察，深悉贵大臣各将官仁厚爱物之意，平生之念复又触发。今则断然决策，将深密请托，假坐贵船中，潜出海外，以周游五大洲，不复顾国禁也。愿执事辱察鄙衷，令得成此事。生等所能为使役，惟命是听。

夫跛蹩者之见行走者，行走着之见骑乘者，其意之歆羡如何耶？况生等终身奔走，不能出东西三十度、南北二十五度之外。以是视夫驾长风、凌巨涛、电走千万里、邻交五大洲者，岂特跛蹩之与行走、行走之与骑乘之可譬哉？

---

[74] 前揭『士規七則』、P. 20。
[75] 『幽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P. 178～179。
[76] 磯野清、『日本武士道詳論・武士の忠』参照、目黒書店、1939 年、P. 421。
[77] 奈良本辰也解説、三笠書房、1993 年、PP. 83～84。
[78] 『幽室文稿付録』、『全集』第四卷。
[79] 『講孟餘話』、『全集』第三卷、P. 327。
[80] 『講孟餘話』、『全集』第三卷、P. 308。
[81] 『吉田松陰書簡集』、岩波書店、1943 年、P. 226。
[82] 前揭『吉田松陰書簡集』、P. 245。

执事幸垂明察，许诺所请，何惠尚之。惟吾国海禁未除，此事若或传播，则生等不徒见追捕召回，刎斩立到无疑也。事或至此，则伤贵大臣各将官仁厚爱物之意亦大矣。执事愿许所请，又当为生等委曲包隐至开帆之时，以令得免刎斩之惨。若至他年自归，则国人亦不必追穷往事也。生等言虽疏漏，意实诚确。执事愿察其情，怜其意，勿为疑，勿为拒。

万二、公太同拜。呈

日本嘉永六年七年三月十一日[83]

瓜中万二和市木公太分别是吉田松阴和其门生金子重辅在“下田事件”的密航渡船时使用的假名。从上面的《投夷书》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1. 吉田松阴等早就有“周游五大洲”之念，但当时“海禁”甚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在“不贷之典”；
2. 触犯“海禁”则“刎斩无疑”；
3. 美舰确有保护吉田之意，“以令得免刎斩之惨”。

从历史上看，吉田出海是受到了其师佐久间象山的指示和支持的。佩理“黑船来袭”之后，了解海外世界就成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急需。期间，清朝魏源（1794～1857）撰写的《海国图志》对吉田松阴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1841 年 8 月，魏源在镇江受与被革职的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1842 年，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海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 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 年刻本扩为 60 卷，1852 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百卷，有 500 卷之多。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全书除了以林则徐的《四海志》为基础外，还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 14 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 70 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魏源亲自了解的材料。其中包括了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 20 种左右的著作。

魏源撰写此书的目的，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就是说要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西方的侵略，而不要盲目的排外。魏源还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可是，很遗憾的是，魏源的这个“以夷制夷”不能为大清所用。倒是在日本很受欢迎。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 卷本，受到了日本的有识之士的欢迎，给当时幕末很多仁人志士很大的触动，吉田松阴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吉田冒着背叛死罪的危险，意欲渡海出外看看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魏源的影响。虽然松阴脱藩后只是一介平民，似乎轮不上“君臣”关系。但松阴提倡天下臣民与君同心协力，“阖国之人为阖国而死，阖藩之人为阖藩而死，臣为君而死，子为父而死”，似乎将臣、民都包括了进去。在松阴看来，自己欲往海外了解世界，为的是日本，不为私利。所以，堂堂正正，不用躲躲闪闪。也因此拒绝了佐久间象山要他以漂流

[83] 《全集》第十卷、《回顾录》所收、PP. 469～471。据夜久正雄在<吉田松陰渡海密書二通について>一文所说，他托亚细亚大学的王瑜教授赴美公干时复印的吉田松阴的《投夷书》的复印件上的日期是“三月八日”。《全集》第十卷的《回顾录》的“三月八日”里记载：“是夜，草投夷书之付启。付启中云：‘横浜村南，南岸断绝，无人家处。故号初更点火，来迎脚船。’其地本行牧时，详卜是。”其中并无记载写《投夷书》。而在“三月七日”里条里记载“六日出草处之投夷书，示象山（佐久间）。象山为增削数字。”《亚细亚大学教养部纪要》15 所收、1977 年、P. 61。

的形式出海的建议，而改为登入停留在下田的美国军舰。被拒绝后，虽然也得美方庇护，但他仍然自行自首，昂然面对可能被判“刎斩”的危险。

而真正导致松阴被判死罪的是他的“刺杀”幕府老中越前鲭江藩藩主间部诠胜及伏见奉行岩村田藩藩主内藤正绳的计划。虽然刺杀计划由于弟子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等的反对而取消。但是从此吉田松阴更加认为幕府是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坚决要求倒幕。为此再次被捕投入野山狱。

安政六年(1859)3 月，发生了“安政大狱”，幕府镇压革命运动，大肆逮捕维新志士。5 月，幕府命长州藩毛利氏将松阴送到江户。6 月中旬抵达江户。江户奉行所对吉田松阴进行第一次审讯时怀疑松阴与尊王攘夷派的梁川星岩、梅田云滨等有什么关系，而松阴为了表明自己的性格光明正大、不做阴谋之事、不仅与狡猾的梅田等人毫无瓜葛，而且还有自己的计划、打算。于是就将嘉永六年美舰来日本以后自己为国为民奔波以及暗杀阁老间部诠胜的计划和盘托出。幕府为之震动，遂将松阴投入传马町监狱。此后，江户奉行所在对松阴进行了第二次审讯后判其流放罪，但大老井伊直弼亲自将江户奉行所定的流放罪改为死罪。其实早在“下田踏海”事件后的第一次入狱时吉田松阴就要被判死罪，只是老中松平忠固、阿部正弘的反对才改判入狱服刑。

正因为松阴认为“即使没有技能，只要能为国家牺牲也是武士”，所以，他才能面对“海禁”、刺杀间部诠胜犯的都是死罪时毫无畏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为国”而不是为自己。因此，在《幽囚录》里他这样说：

> 近时海贼猖狂日甚一日。及至今春，遂为城下盟。而其祸患，未知底所。于是忠孝节义之士皆概念泪下，无不思雪耻报仇。矩方虽钝劣，蒙世世豢养，窃思报效。遂以身犯典，为父兄之大忧。……然窃谓赤穗诸士为主报仇，甘犯都城弄兵之典；矩方为国效力，甘犯兰出海外之典。[84]

很显然，松阴下田踏海完全是知道结果、并且冒着死罪而去的。在他看来，出海完全是“为国效力”，所以，不惜“以身犯典”。

正是由于吉田松阴的这种实践性的行动和倡导，原本要求武士、臣子对“君主”的“忠孝”、“不怕死”的道德规范，被要求到了普通百姓身上。在日本受到西方列强侵害的时候，孟子的“君臣论”被吉田活学活用地普及到普通百姓身上，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臣子对君主的“生死”、“忠孝”了。受此影响，他的门人、友人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前原一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品川弥二郎、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山田显义、野村和作、斋藤英藏、寺尾新之允、生田良佐等成为日后倒幕攘夷、明治维新的先驱功臣。

三、结语

《讲孟余话》是吉田松阴最著名的一部著作，不仅量多，而且涉及内容也多。他通过讲解《孟子》来表现自己的主张。本文所论述的“国体观”“君臣观”只是《讲孟余话》中的一部分思想。而其中的有些思想是相互间交叉融汇在一起的。

《孟子》作为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在最初的流行后开始逐渐受到日本主流社会的排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孟子的“易姓革命”和“民贵君轻”的思想。尤其到了吉田松阴的幕末末期，由于日本社会的政权长时间不在天皇手里，孟子思想与当时日本社会显

[84] <幽囚录>、《全集》第一卷、P. 388。

得格格不入。

这时候，正好是大清 1840 年鸦片战争战败后的 13 年后，1853 年、1854 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理两次亲率舰队抵达日本，以武力敲开了日本的国门，签订了一些列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日本长期的闭关锁国的政体。

面对幕府的软弱无能和日本自身的不足，如何摆脱象大清一样被欧洲列强殖民、瓜分的命运，就成了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当时许多幕府志士的头等大事。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吉田松阴通过在狱中对囚人讲解《孟子》，提出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特有的“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国体论”、“君臣论”等，并通过与藩儒山县太华就《讲孟余话》的论争，逐渐由“谏幕”转向“倒幕”。与通常解读、正字、释句不同，吉田松阴在解读《孟子》时有所取舍，不全接受，也不全否定，而是利用《孟子》章句，针对时弊，试图找到一条拯救日本的道路。

不仅如此，受他思想影响的友人和门生们推动或参与了明治维新，成为近代日本的开国功臣。据不完全统计，其门生不下90余人，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而受爵位者、赠位者、有位者多达37人。其中有“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初代总理伊藤博文、第三、第九代总理山县有朋等。